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彭安明, 朱红根*, 康兰媛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 724 份问卷调查数据, 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 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 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关键词: 城市融入; 影响因素; 农民工;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23.6;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4)05-0055-06

Urban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PENG An-ming, ZHU Hong-gen*, KANG Lan-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n urban inte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724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y 0.157766. Educational degree and working years had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The effects of age, marriage, sibling number were not significant. Whether being a relative of s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n association of fellow provincials or townsmen woul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enterprise differences among the level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hile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ol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as merely affected by educational degree and working year.

Key words: urban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migrant worker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通常经历农民 - 农民工 - 市民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生产, 即“非农化”过程, 第二阶段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即真正实现“市民化”过程^[1]。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不仅有利于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 而且有利于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因此, 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对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一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测度。张蕾等^[2]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层面分析了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 并依照融入水平的高低将城市融入类型分为隔离型、选择型和融入型。何军^[3]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

收稿日期: 2014-07-15

项目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JY053);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C790119);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11GL08);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基金

作者简介: 彭安明(1988—), 男, 江西吉安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通信作者。

感三方面测度了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许传新^[4]则从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生活适应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性。二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童学敏等^[5]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促进作用,新型异质社会资本正向作用显著,同质社会资本却有负面影响。金崇芳^[6]认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和务工年限皆有显著影响。梅亦等^[7]认为学历、性别、健康状况对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皆有重要影响,而普通话水平仅对社会融入有影响。三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问题的探讨。马云献^[8]指出,就业问题是关键,提升就业能力是重要途径。陆康强^[9]认为,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问题是两大主要障碍。李强^[10]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外来农民工的“不融入”问题和农转非人口的“半融入”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利用全国 724 份农民工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来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 2012 年 7~8 月对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农民工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8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724 份,有效样本率为 90.5%。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务工区域、从事行业、在岗时间等择业特征,农民工对相关管理政策的满意度评价以及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等。根据一般定义,新生代农民工是指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拥有农业户口,却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在 724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问卷 572 份,占总量的 79.01%,老生代农民工问卷 152 份,占 20.99%。

调查样本中,农民工年龄处于 20 岁及以下的占 16.99%,21~26 岁的占 36.33%,27~32 岁的占 25.69%,33~40 岁的占 16.71%,40 岁以上只有 4.28%。男性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为 34.25%,比女性的比例低 31.50 个百分点。农民工的未婚率较高,尚未结婚的占 42.13%。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小学及以下占 9.53%,初中及以上占 90.47%,其中,高中占 32.73%,大专及以上占 6.63%。农民工选择珠三角地区务工的比例为 42.13%,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占 54.83%。农民工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比例为

45.58%(表 1)。

表 1 样本农民工统计描述

特征	分类	频数	比例/%
年龄	20 岁及以下	123	16.99
	21~26 岁	263	36.33
	27~32 岁	186	25.69
	33~40 岁	121	16.71
	40 岁以上	31	4.28
性别	男性	248	34.25
	女性	476	65.75
婚姻	已婚	419	57.87
	未婚	305	42.13
文化程度	文盲	15	2.07
	小学	54	7.46
	初中	370	51.10
	高中	237	32.73
务工区域	大专及以上	48	6.63
	珠三角地区	305	42.13
	长三角地区	397	54.83
企业性质	其他地区	22	3.04
	公有制企业	330	45.58
	非公有制企业	394	54.42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测度

1.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 11-13],从职业融入、社会融入、行为融入和政治融入四个层面来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首先,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职业融入程度是决定其能否融入城市的基本物质条件,因此选取职业稳定性、收入水平与城市职工的差距、工作劳动强度评价来测度职业融入。其次,农民工日常行为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也是衡量其城市融入程度的重要方面,这一层面主要通过时事关注行为、行动计划习惯、超前消费行为来测度。再次,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是形式上的融入,更多的是社会观念、精神层次的接纳与融合,主要通过农民工穿戴习俗及语言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城市风俗了解度和农民工留城意愿来测度。最后,政治融入主要通过农民工参加社区选举、民主决策和党团活动情况来测度。

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法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进行测度,每一指标的取值范围从 1 分至 5 分,分值越高代表融入程度越高,如表 2 所示。

表 2 农民工城市融入各维度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描述

变量及测量项目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职业融入 A ₁ : 你目前职业的稳定程度如何?	1=很不稳定, 2=比较不稳定, 3=一般, 4=比较稳定, 5=很稳定	2.56	1.087
A ₂ : 你目前收入水平与城市职工的差距如何?	1=很大, 2=较大, 3=一般, 4=较小, 5=很小	2.01	0.944
A ₃ : 你目前工作的劳动强度如何?	1=很大, 2=较大, 3=一般, 4=较轻松, 5=很轻松	2.40	0.862
行为融入 A ₄ : 你经常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吗?	1=很少, 2=较少, 3=一般, 4=较经常, 5=很经常	2.61	1.284
A ₅ : 你经常会把要做的工作列成计划表吗?	1=很少, 2=较少, 3=一般, 4=较经常, 5=很经常	2.27	1.156
A ₆ : 你是否赞同信用透支等超前消费行为?	1=很不赞同, 2=不赞同, 3=一般, 4=较赞同, 5=很赞同	2.13	1.051
社会融入 A ₇ : 你的服饰衣着及语言与城市居民相比差异如何?	1=很大, 2=较大, 3=一般, 4=较小, 5=很小	2.72	1.047
A ₈ : 你对本地语言、风俗的了解程度如何?	1=很不了解, 2=不了解, 3=一般, 4=了解, 5=很了解	2.38	0.921
A ₉ : 你希望长期留在城市工作的意愿如何?	1=很弱, 2=较弱, 3=一般, 4=较强, 5=很强	2.95	1.038
政治融入 A ₁₀ : 你是否经常参加社区选举活动?	1=很少, 2=较少, 3=一般, 4=较经常, 5=很经常	1.56	0.836
A ₁₁ : 你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1=很少, 2=较少, 3=一般, 4=较经常, 5=很经常	1.41	0.703
A ₁₂ : 你是否经常参加当地的党团活动?	1=很少, 2=较少, 3=一般, 4=较经常, 5=很经常	1.30	0.652

2. 测度结果分析

对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维度的变量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 测度职业融入的 3 个变量的 KMO 值为 0.638,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统计值为 260.332, 其显著性水平(sig.值)达到 0.000; 测度行为融入的 3 个变量的 KMO 值为 0.573,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统计值为 140.094, 其显著性水平(sig.值)达到 0.000; 测度社会融入的 3 个变量的 KMO 值为 0.59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统计值为 130.292, 其显著性水平(sig.值)达到 0.000; 测度政治融入的 3 个变量的 KMO 值为 0.64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统计值为 526.131, 其显著性水平(sig.值)达到 0.000。这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 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4, 大于 0.7, 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量表的信度很高, 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符合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民工城市融入各维度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及测量项目	因子载荷值	方差贡献率
A ₁	0.744	57.374%
A ₂	0.729	
A ₃	0.797	
A ₄	0.757	50.054%
A ₅	0.776	
A ₆	0.570	
A ₇	0.743	50.220%
A ₈	0.647	
A ₉	0.732	
A ₁₀	0.776	66.030%
A ₁₁	0.875	
A ₁₂	0.783	

每个维度下的变量都能聚合成 1 个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在 50%以上, 各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值在 0.5 以上, 绝大多数在 0.7 以上, 说明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各维度的收敛效度较高。

根据罗明忠^[11]的处理方法, 对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个因子赋予相同的权重 0.25, 从而计算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得分。表 4 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融入的平均得分最高(0.061 20), 其次是政治融入(0.058 23)、社会融入(0.017 92), 而行为融入的得分为负值,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行为融入层面的水平有待提高; 老生代农民工的行为融入的得分最高(0.0182 9), 然后依次为政治融入(-0.067 43)、政治融入(-0.219 11)和职业融入(-0.230 32), 表明老生代农民工目前的职业收入较低, 其收入及工作稳定性远不如城市居民。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整体城市融入水平比老生代农民工高, 而且在职业融入、社会融入和政治融入层面比老生代农民工更具优势。因此, 相对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更具备市民化的潜质。

表 4 新生代、老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因子得分

	职业融入	行为融入	社会融入	政治融入	综合得分
新生代农民工	0.061 20	-0.004 86	0.017 92	0.058 23	0.033 122
老生代农民工	-0.230 32	0.018 29	-0.067 43	-0.219 11	-0.124 644

注: 因子得分均为标准化得分。

四、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

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般而言, 年轻农民工的思想观念相对更开放, 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及能力更强, 可能更容易融

入城市。男性农民工更具冒险精神,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更强,因而比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已婚农民工因子女教育问题融入城市的意愿可能更迫切,其城市融入水平可能比未婚农民工更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雄厚,较易获取高报酬的工作,对城市适应能力和认知感也更强,其城市融入程度可能更高。通常地,由于家庭成员的同质性以及强关系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越多的农民工,可能因家乡情感倾向于选择返回农村,其城市融入水平可能越低。社会关系网络在提供物质帮助、信息资源或情感交流等方面能有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将会对农民工获取信息资源、社会支持产生影响,进

而可能影响城市融入程度。此外,务工经历越丰富的农民工,社会经验积累越雄厚,越有助于融入城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政府出台政策的差异,可能导致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农民工,因企业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源等优势,其城市融入水平可能比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更高。为验证以上假设,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y_i = \alpha_i + \bet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式中, y_i 代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得分, α_i 代表常数项, X_i 为解释变量, β_i 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 ε_i 为随机误差项,各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表5所示。

表5 解释变量的取值及描述统计

自变量	定义及取值	样本均值	标准差
年龄(X_1)	20岁及以下=1, 21~26岁=2, 27~32岁=3, 33~40岁=4, 40岁以上=5	2.55	1.086
性别(X_2)	男性=1, 女性=0	0.34	0.475
婚姻(X_3)	已婚=1, 未婚=0	0.58	0.494
文化程度(X_4)	文盲=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大专及以上学历=5	3.34	0.795
兄弟姐妹数(X_5)	2个及以下=1, 3~4个=2, 4个以上=3	1.73	0.712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X_6)	是=1, 否=0	0.19	0.391
参加同乡会(X_7)	是否参加过同乡会:是=1, 否=0	0.32	0.466
务工年数(X_8)	3年以下=1, 3~5年=2, 6~10年=3, 10年以上=4	2.29	0.959
择业区域 R_1 (X_9)	择业区域 R_1 : 以其他地区为对照组, 珠三角地区=1, 其他区域=0	0.42	0.494
择业区域 R_2 (X_{10})	择业区域 R_2 : 以其他地区为对照组, 长三角地区=1, 其他区域=0	0.55	0.498
企业所有制(X_{11})	公有制企业=1, 其他企业=0	0.46	0.498

利用 SPSS18.0 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依次为农民工整体、新生代农民工和老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二和模型三中将年龄变量剔除,以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回归结果显示,3个模型的F值分别为15.843、14.145和4.509,皆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三个模型的整体模拟效果良好。

2.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

性别变量在模型一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表明男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高于女性农民工。这与梅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7]。相对于女性的思想保守,男性农民工更具风险偏好,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更强。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平均得分为0.152 661,明显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得分(-0.079 538),可见,性别是重要影

响因素之一。

文化程度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越高,其融入城市程度越高。这与笔者的预判基本一致。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综合素质越高,适应新环境的意愿及能力越强,越容易融入城市。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小学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590 874和-0.180 894,而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明显更高(其相应得分值为0.141 244、0.279 880)。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变量在模型一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有亲属在政府部门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比普通农民工更好。这主要可能是因为亲属在政府部门,农民工较易获取政府有关城镇化的政策信息或者其他社会资源,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关系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思想认识,帮助他们较快地融入城市。调查数据显示,有亲属在政府

部门的农民工和无亲属在政府部门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平均综合得分为 0.104 610 和-0.024 196。

参加同乡会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参加过同乡会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水平比无此经历的农民工更高。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参加过同乡会的农民工,能利用该平台分享信息资源,交流异地情感,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好地融入城市。调查结果表明,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综合得分为 0.189 343)明显高于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综合得分为-0.088 156)。

务工年数变量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务工经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作用,即务工时间越长,所掌握的技能和社会阅历越多,收入水平越高,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奠定良好基础。

从不同择业特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来看,公有制企业农民工比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更易融入城市社会。这可能是因为公有制企业的农民工,其工作收入相对更稳定,社会资源也更丰厚,

融入城市遇到的困难相对更少。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比其他地区更低,可能的解释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文化生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与市民的隔阂较大,较难融入当地社会。

另外,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 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由表 6 可知,文化程度变量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皆在 1%的水平上显著,务工年数变量在模型二中在 5%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三三中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文化程度、务工年数都是影响新生代和老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老生代农民工,其城市融入水平仅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说明较低的人力资本严重影响了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收入水平,进而抑制了他们融入城市。可见,无论老生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将显著促进其融入城市。

表 6 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年龄	-0.017	0.031				
性别	0.096*	0.052	0.071	0.060	0.158	0.106
婚姻	-0.073	0.062	-0.080	0.063	-0.061	0.194
文化程度	0.185***	0.031	0.170***	0.035	0.263***	0.062
兄弟姐妹数	-0.041	0.035	-0.057	0.041	0.032	0.066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	0.117*	0.060	0.182***	0.070	-0.104	0.118
参加同乡会	0.204***	0.051	0.202***	0.057	0.159	0.114
务工年数	0.060**	0.030	0.079**	0.035	0.091*	0.051
择业区域 R ₁	0.080	0.137	0.159	0.155	-0.179	0.288
择业区域 R ₂	-0.312**	0.137	-0.291*	0.154	-0.327	0.288
企业所有制	0.186***	0.048	0.200***	0.055	0.081	0.101
常数项	-0.666***	0.197	-0.698***	0.222	-1.086**	0.470
模型 F 值	15.843***		14.145***		4.509***	
调整 R ²	18.4%		18.7%		18.9%	
样本量	724		572		152	

注: *、**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

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变量和参加同乡会变量,在模型二中皆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模型三中不显著,表明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和参加同乡会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而对老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正向作用,而对老生代农民工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新

生代农民工社会阅历较少,社会经验及社会资本相对老生代农民工更稀缺,因而更需要依靠政府部门的亲属或者参加同乡会来帮助其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老生代农民工的区域差异不明显。相对而言,长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综合得分为-0.160 414)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

(综合得分为0.293 286)。

不同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存在差异,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不显著。公有制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0.087 856)明显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0.015 130)。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对所在企业的工作待遇及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因而待遇较好的公有制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及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更强。

五、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务工年数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企业差异,而这些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要加大农民工文化教育投入。首先,加强农村地区基础性教育的投入,合理规划农村教育设施的撤并,加强新农村教育改革,保障农村教育的发展;其次,积极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增强农民工专业技能,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第二要创新农民工再教育的渠道。充分发挥社会各类机构组织的积极性,借助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的力量,如合理整合现有高等院校资源、利用社会慈善捐助,多渠道、多元化地发展农民工再教育。第三要加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目前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局限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型网络,异质性社会资本十分有限,而该类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因此,政府应积极策划、组织公益性交流活动,在安排农民工参加就业招聘会的同时,也应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社区之间的互动。第四要重点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农民工的主力军,而且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意愿及融入能

力都强于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重点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有着较深的乡土情结,更倾向于返回农村,政策应合理分流疏导。总之,尊重农民工的意愿,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与效率,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何军.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法[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6): 15-25.
- [2] 张蕾, 王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以杭州市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4): 23-28.
- [3] 何军.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1): 52-60.
- [4] 许传新.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 南方人口, 2007(4): 52-59.
- [5] 童雪敏, 晋洪涛, 史清华. 农民工融入: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2(5): 33-37.
- [6] 金崇芳.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籍农民工为例[J]. 资源科学, 2011, 33(11): 2131-2137.
- [7] 梅亦, 龙立荣. 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6): 203-207.
- [8] 马云献. 就业能力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2(11): 117-120.
- [9] 陆康强. 特大城市外来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融入倾向——基于上海抽样调查的观察和分析[J]. 财经研究, 2010, 36(5): 65-77.
- [10] 李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 河北学刊, 2011, 31(5): 106-114.
- [11] 罗明忠, 卢颖霞. 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城市融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5): 10-23.
- [12]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6): 82-89.
- [13] 刘传江, 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 2004, 28(5): 12-18.

责任编辑: 陈向科